

新一轮转型需从多个维度展开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改革开放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的第一轮经济转型,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换,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变化,拉开新一轮经济转型序幕。成功完成新一轮转型,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新一轮转型需从哪些维度展开?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表现?转型的核心环节在哪里?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记者: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去年我国经济增长逐季下滑,PPI同比40个月下降,且跌幅较大,但一些结构性指标出现明显改善。如何看待目前经济表现?经济增长达到均衡点尚需哪些条件?新一轮转型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王一鸣: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国推动务实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1979至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增速明显高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高于国际组织的预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从年度增长率看,2007年经济增长14.2%,2015年增速与之相比下降了一半。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由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因素表现在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支撑要素驱动增长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2012年以来,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逐年减少,当年减少205万人,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人口抚养比呈逐年上升态势,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这样,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放缓,资本投入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下降而放慢,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减速就难以避免。与此同时,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环境容量也难以承受,生态环境硬约束不断强化。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势必会出现经济减速的过程。利用麦迪逊数据库对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减速时的人均GDP区间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经济体增速急剧放缓出现在4000至15000国际元之间,约占全部经济体的四分之三。根据麦迪逊数据库,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7371国际元,2015年约11000国际元,正处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与此同时,我国与国际样本也有偏离。绝大多数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后的第四个十年,增长率都低于4%。我国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目前仍保持7%左右的增速,增速明显高于一般国际样本。这与我国区域增长的梯次推进是分不开的,东部沿

海地区减速,但中西部地区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东部增速放缓,但由于东部地区经济体量大,中西部地区经济提速还不足以完全对冲东部增速放缓,全国整体经济增速还是放缓了。

2010年2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在波动中下行,到2015年1季度已持续20个季度。经济增长要达到均衡点,仍需满足一些条件。从需求侧看,投资增速要逐步见底。目前,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影响,增速仍有可能放缓,基础设施投资随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渠道受限,增速还可能放缓。从供给侧看,要形成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的机制,使过剩产能得到“出清”。从增长动力看,新动力要成为主导力量,有效替代旧动力的衰竭。经济增长逐步达到均衡点的过程,也是新一轮转型深入展开的过程。

记者:实现新一轮转型应围绕哪些维度展开?如何处理好速度与转型的关系?转型的核心环节在哪里?已取得了哪些进展?

王一鸣: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守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新一轮经济转型需从多个维度展开,包括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经济增长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特别是消费需求潜力;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有效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培育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成功完成新一轮转型,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

从近两年情况看,新一轮转型已经展开并取得积极进展。近两年来研发投入大幅增长,占GDP的比重超过2%,其中70%以上是企业研发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连续多年高于50%,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4%,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业增加值超过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6%。

记者:改革应在新一轮转型中扮演什么角色?主要从哪些重点领域突破?

王一鸣:新一轮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改革开放,解放了被落后经济体制束缚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新一轮转型需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实施战略创新驱动。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等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

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更加开放便捷地吸引国际人才。

第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环节提升。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吸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

第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监测预警方法。

第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深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试点,积极探索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

文/本报记者 马志刚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刘明

提要 法治的力量来源于民众对法治的信仰和拥护。只有人民内心拥护法律,全社会信仰法律,法律才能发挥作用,法律权威才能真正树立,法治社会建设才能真正得以推进。要在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完善机制、让领导干部成为表率等方面下大功夫,从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党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而且需要全民守法,需要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需要全民的参与和支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大任务。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的力量来源于民众对法治的信仰和拥护。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中。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只有人民内心拥护法律,全社会信仰法律,法律才能发挥作用,法律权威才能真正树立,法治社会建设才能真正得以推进。

这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高度重视培育全社会法治意识。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培育全社会法治意识提出要求部署,并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主要任务和总的要求。这些都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和新境界。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深化,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但仍需要看到,我国法治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不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群众“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访不信法”,遇事找熟人、走关系等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地方“工闹”“医闹”“拆迁闹剧”等情况比较严重,等等。这些问题和现象之所以存在,分析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全社会法治意识不强,法治观念尚未真正树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从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让领导干部成为表率等方面入手,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第一,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是首要。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如何真正将法治意识融入公民血液?这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全体公民广泛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一是创新普法宣传形式。要善于抓住重点、分类施教,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特别是要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为公众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学法渠道,提高普法实效。二是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

第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是重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这是培育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制度动力和有力保障,有利于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遵纪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一方面,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真正让“人无信不立”。特别是要形成有利于弘扬诚信的良好政策导向和利益机制,无论是在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规划时,还是在出台经济社会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时,都要把守法经营、诚实守信作为重要内容,引导人们把守法诚信作为立身之本。另一方面,还要完善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实行失信发布制度,建立严重违法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建立多部门、跨地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失信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深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试点,积极探索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

第三,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领导干部带头是关键。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他们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带头学法、遵法、守法、用法,就会成为引导群众尊重法律权威、自觉守法用法的重要带动力量。由此可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建设法治社会,领导干部是关键。在这一过程中,领导不仅要带头学法,还要带头守法,更要带头用法;不仅要强化法治秩序思维,实现从人治方式向法治方式的转变,还要强化法治规则思维,认识到法治思维的本质是规则治理,从而从经验决策向依法决策的转变。此外,还要强化法治权威思维和法治责任思维,真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承担起重要责任。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发挥区位优势 培育新增长极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设,加快形成两小时交通圈。在水运方面,强化长沙霞凝新港的枢纽作用,加快建设成为我国中部重要的物流园区;选择湘阴县漕溪港作为其深水外港,成为连接长株潭与城陵矶港的内河枢纽港口,实现水陆联运;通过岳阳口岸,加强与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联系,全面对接中三角。在航运方面,实施长沙黄花机场飞行区东扩工程、空港配套工程等项目,将长沙机场打造成长江中游重要的国际空港枢纽,增强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战略支撑力。在物流方面,争取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通关合作一体化,打造统一的申报、风险防控、专业审单和现场作业平台,实现“多地通关、如同关”,建立城市群物流城市配送体系。

其二,把握融入的产业节点,加快推进产业融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长江流域产业结构优化梯度转移倾向明显。长株潭将加大对接上海自贸区、“一带一路”力度,主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将产业高度集中的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整体规划,注重生产要素聚集与生活要素配套,促进城市化与

产业集群的同步发展。要依据现有产业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长沙有着科研资源优势 and 创意产业优势,应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株洲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产业基础和研发优势,应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和轨道交通装备及零部件产业。湘潭有着机电一体化特色产业基地,整合高新区在机电一体化领域的科技创新资源,应重点发展应用于工程机械、风电装备、城轨车辆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环保节能机电装备及零部件产业。要发展“飞地经济”,打造产业对接协作平台。要加快产业融城步伐,建设智慧城市群。既突出本地的产业优势,又要加强与武汉、南昌的区域创新的协同效应,全面推进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系列化的服务应用,创造优良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城市管理数字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

其三,把握融入的生态节点,推动城市群“两型”品质建设。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为依据,以武汉、长

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为引领,推进三大城市群的“两型”品质建设,把长株潭建设成为湘江流域生态人居环境建设示范区。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重点整治水、大气、重金属和农村环境污染,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要推进湘江和“四水”流域的综合治理。坚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方式、建“两型”的战略重点,构建符合“两型”要求的产业体系、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其四,把握融入的体制节点,打通区域协作的“最后一公里”。要顺势而为,树牢长江中游“一盘棋”思想,强化城市群之间,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上下游省份之间的合作的深化和拓展,促进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的主动率先融入,创新驱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建立和强化利益协商机制,强化和完善城市群之间多层次联席会议制度,还要培育和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真正促进城市群之间的合作与发展。

(执笔:邓子纲 贺培元)